

新亚书院学术年刊

第二期

新亚书院学术年刊编辑委员会

新亚书院

004987

新學書院藏



S9004150

吳因明 謝士文 伍鎮遠 楊汝梅 孫國棟 張丕介 任國榮 謝時康 謝振興 謝三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一九六〇）九月出版

新亞書院學術年刊 第二期

定價每冊：港幣拾元 美金貳元

編輯者

新亞書院學術年刊
編輯委員會

出版者

新亞書院
香港九龍農圃道六號

製版兼
印刷者

求精印務公司

香港九龍黑布街二十五號
電話：五五七二二

(A17)

目錄

杜威教育思想的再評價	吳俊升
論知識中之真理之意義與標準	唐君毅
柏烈得萊的玄學	謝幼偉
魏晉名理正名	牟宗三
關於詩經幾個問題的商榷	何敬羣
史記導論	潘重規
釋佛家之聲聞道	羅時憲
依利莎白戲劇之思想與文學背景	劉若愚
釋維他命 B ₂	任國榮
「饑餓地理」與人口新說	張丕介
北宋農村戶多口少問題之探討	孫國棟
自由經濟中的會計	楊汝梅
凱因斯理論之歷史的論證	伍鎮雄
近代歐洲繪畫試評	陳士文
晚明江南佛學風氣與文人畫	吳因明

新亞書院學術年刊第二期編輯前誌

一 本刊旨在刊布本院師生學術研究論文。

二 本刊文稿每篇以五萬字爲限。

三 本刊各文排列次序，略依哲學、史學、經學、文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

美學之性質。其性質不易顯然劃分者，列於其近似之序列。

四 本刊仍蒙趙鶴琴先生惠題封面，書此誌謝。

目錄

杜威教育思想的再評價

吳俊升

約翰杜威 (John Dewey) 乃本世紀最重要的教育哲學家。他在教育理論和實施方面的影響，不僅及於美國，還及於全世界。他的影響之大，當代很少教育家可以和他相比的。可是在過去二十多年中，他的教育思想，在美國頗受批評。不論他的教育理論體系或其實施的結果，都大為貶值。近年來蘇俄對於太空研究的領先，引起美國的震驚，更增強了貶抑杜威教育思想的趨勢。在教育界已經掀起了一種反杜威的運動。此種運動不僅在美國進行着，在世界其他各國亦漸漸發生影響。

經過嚴格的批評以後，杜威對於教育的貢獻，頗有湮沒不彰的趨勢。其實杜威的教育理論體系，正和任何理論體系一樣，有其優點，亦難免有其弱點。我們如其不分皂白，拋棄其整個體系，將為教育方面一大損失。我們應該對他的整個教育理論體系重加檢討，把他的根本理論和他的一些門徒的誇大的傳述和引伸，加以區別。我們應該實施的結果，來判斷他的教育思想的得失。唯有如此，才能對他的思想的真正價值加以客觀和公正的判定，才能認識這位教育大師在教育史裏的正確地位。其結果將有裨於美國和美國以外的教育的理論和實施。

本文作者對於杜威教育思想的價值的重估，有雙重興趣。第一，作者本國的教育實施，曾受杜威很大的影響。中國教育將來的實施，可因重估杜威的理論體系而獲裨益。第二，作者本身所受的教育，即曾有一部分受過杜威的影響。作者在歐洲研究教育期間，更從歐洲教育學者和教育家的觀點來觀察杜威的理論體系，以補充個人的觀點。其結果為在一九三一年刊布其論文「杜威的教育學說」(La Doctrine Pédagogique de John Dewey)。此論文經巴黎沃仁哲學書局(Librairie Philosophique, J. Vrin, Paris)於一九五八年再版收入哲學史叢書。(Bibliothèque d'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作者曾數次訪問杜威與美國，並曾參觀曾受杜威影響的日本、土耳其以及歐洲的若干學校；在過去數十年中，由於在大學任教「教育哲學」或從事教

育行政工作，曾經繼續不斷的密切注視杜威教育思想的演進和它的影響。因為此種背景，又因為最近曾經獲得亞洲協會的資助，能再赴美國就此問題作實地研究攷察，作者才敢作重估杜威教育思想的價值的嘗試。以下便是此種嘗試的結果。

在詳察杜威教育思想在美國的現況以後，最令人感觸的，即在杜威去世僅八年，他的聲望已如此大為低落。他的一個門人甚至曾經指出，曾經有人說過，如杜威今尚健在，美國任何地區的教育委員會將不選他為委員。（註一）白柔克門教授（Professor W. Brickman）也曾痛惜『杜威的聲名，由於那些不了解他的思想的人把一切教育缺點歸咎於他，而被曳入泥塗。』（註二）在事實上，對於杜威的批評和攻訐來自四面八方——各種不同宗派的哲學家、與師範學院對立的文理學院的教授、公私學校的教師、作家和記者、學生家長、教會人士，以及不同宗派的教育理論家，幾乎是羣起而攻之。這種近於「圍攻」的現象，實是驚人。

一代宗師的杜威，何以他的聲望在死後如此快速的低落呢？依作者的看法，有幾件事實可以用來作初步的說明的。第一，美國現時一般的知識的和道德的氣氛漸漸轉變，和杜威的一般哲學不再互相投契。在兩次世界大戰以後，又面臨蘇俄將掀起第三次大戰的威脅，美國人民已經發現，這個世界比杜威在他的存在、生命、和經驗的哲學中所描叙的更飄忽無定，人類生命更屬危殆不可終日，人生經驗和前途也更更渺茫。當人們還有自信心時，杜威所主張的一切都在未定之天的哲學是有鼓舞的作用的。它曾被歡迎為人們奮鬥的南針；人們本此哲學，運用他的智慧，來努力改造世界和他自身的生活，而促成進步。可是此時在這危如累卵的世界，人已經失去了自信心；他很自然的在知識和道德方面，從自然主義趨向超自然主義，從經驗的和科學的求知方法趨向於神祕主義，從相對論趨向於絕對論。總而言之，杜威的哲學，就一般而論，已不再適合於世

情和人們的情調了。現時在美國與杜威思想相反的各派思想，如新湯姆主義 Neo Thomism，如惟心論，如新人文主義，如禪宗佛學，如瑜珈學說，如道家學說的紛紛代興，充分說明了實用主義已經不再是美國思想的主宰了。杜威教育思想的衰落，只是時代精神的變遷的自然結果而已。

其次，杜威的教育主張很不幸和現在頗受非議的所謂「前進教育協會」Progressive Education Association 的立場，常被混為一談。前進的教育實施，流弊滋多，乃不可否認的事實。在事實上，「前進教育協會」并非杜威所創立的。他甚至曾經數次拒絕和該會發生關係。（註三）他也曾數次批評和糾正它的過分極端的傾向。他的較晚年著作之一，「經驗與教育」（Experience and Education），即是一面明白表示其自己的立場，一面糾正所謂前進教育家對其學說的曲解和實行偏差的。事實雖然如此，但是因為杜威曾被公認為前進教育的泰斗，所以批評家將一切前進教育的缺失，都歸罪於杜威（註四）。杜威的聲望便因此種誤會和歸咎而大為減損了。

第三件事實可以解釋杜威的權威的失墜的，便是在最近有一時期，對於太空探討的競賽，美國會遠落蘇俄之後。批評家將此種落後現象，歸罪於美國科學和工程的水準的低落，而科學與工程水準的低落，則又歸罪於杜威的教育哲學。海軍名將芮渴夫（Hyman G. Rickover）在最近美國國會關於蘇俄教育的報告中，以及在他的近著「自由與教育」（Freedom and Education）中，便曾激切的批評杜威和他的學派，認為他們的教育理論，應負美國科學與工程比較蘇俄落後的責任。

美國中學和大學的教育程度，比歐洲同階段的教育落後兩年，此乃多年來歐美教育家所公認的事實。可是在兩次大戰勝利以後，美國人以國力格外增強，未免躊躇滿志，對於教育程度的比較落後，無所繫心。可是自從蘇俄放射第一顆人造衛星以後，美國人民在相形見絀之下，才開始感到教育成為國家存亡一大問題。現在他們對於整個美國教育體系蹈瑕抵隙，尤其對於杜威的教育理論作嚴格的批評。所以杜威便成了一切失敗的替罪羔羊了。

最後，杜威教育思想體系自身的若干缺陷，也是招致誤解和在實行上發生偏差、引起聲名低落的原因。關於杜威教育學說的批評，并不自近日起始。遠在創辦芝加哥大學實驗學校及發表「民主主義與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以後，

杜威即會零星的受着美國和國外的教育學者的批評。許多善意的批評家如柏格萊 (William C. Bagley)、何恩 (E. H. Horne)、福斯脫爾 (Frederick Norman Foerster)、闕德爾 (I. B. Kandel) 和郝欽斯 (R. M. Hutchins) 等人，都會從不同的立場，對於杜威的教育理論和實施，先後加以批評。本文作者也會在教育論著中對於杜氏學說有所批評和保留。尤其在約三十年前所發表的「重新估定新教育的理論與實施的價值」一篇論文中，早經將杜威及其學派的教育主張可能發生的流弊指出。可是在過去近五十年當中，杜威的聲望正隆，所有的批評均未受重視。而現時由於各種因緣的會合，杜威乃成為衆矢之的了。

11

大思想家在初逝世以後，常受嚴格的批評，此殆為通例。為求對於杜威取公正之態度，他的教育思想體系應受公平的再評價。可是此時作再評價，未免嫌早。因為要衡量一個大思想家，蓋棺還不能論定。還要經過一段相當長久的時間，也許在距今數十年或百年以後，一個教育史家才可以居於適當的地位，對於杜威的教育思想的得失，加以公平的評議。可是因為杜氏教育哲學在過去，不僅在美國，還在其他若干國家（包括中國在內），成為教育實施的南針，即在現時，仍然發生很大的影響；對於它的得失利病，重新加以評斷，以供實施的參考，實屬急切的需要。

杜威對於美國以及世界的教育的貢獻是甚麼呢？在教育史裏，杜威承繼了一種長遠的教育改革運動。這改革運動起自文藝復興時期，從蒙泰涅 (Montaigne) 經過盧騷 (J. J. Rousseau)、裴斯塔錄齊 (Pestalozzi)、福祿培爾 (Froebel)，直到在歐洲起源而在美國發展的所謂「新教育運動」(New Education Movement)，乃是一脉相承的。杜威便是在廿世紀中繼承並發揚光大這一運動的大師。他在這一運動中，批判和校正了傳統教育中的學究主義、形式主義和嚴格主義，而在現代學校

中引發了更多的生氣、更多的自由、和更多的實際經驗。這一運動如不推進至極端，而能保存傳統教育的優點時，對於青年的教育是很有益的。對於這一現代化、人道化和具有解放作用的教育運動，給予一個比較完整嚴密的教育哲學的體系的，便是杜威。在現時美國所有的小學中，在大部分的中學中，在少數的大學中，比五十年前顯然有較多的生趣和愉快的氣氛，有較多的自由和獨創的精神，學生間與師生間有較多的合作，有較多的實際的和創造的活動，有較多的反省的思維，在團體生活中有較多民主方式，這差不多都是杜威的貢獻，也是他的教育思想在實施方面的優良表現。這些優點，在將來的實施上仍需繼續發揮。我們雖然承認，在校正傳統教育的缺失時，教育的鐘擺不免擺向一極端；但是我們不應該讓它擺回另一極端。否則扶得東來西又倒，教育將無進步之可言。

以上只是概略敘述杜威教育思想體系的優點。現在我們要考察有關它的缺點的種種批評。在現時美國，如我以上所述，所有教育方面發現的缺點，差不多全部歸咎於杜威。可是主要的批評，卻集中於以下各點：（1）自由問題（Freedom）、（2）生活適應問題（Life adjustment）、（3）職業教育（Vocational education）、（4）趨慕時尚（Fads and fads）、（5）兒童中心與社會中心學校（Child-centered and community-centered school）、（6）教育即是生活而非生活的準備（Education is life, not a preparation for life）、（7）反理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8）精神價值的忽視（Neglect of spiritual values）。

在我們檢討這些批評以前，有一點必須表明的。即是在所有美國的大思想家之中，杜威乃是最少受了解的。這是由於他的著作和講演都是晦澀難解。（註五）胡克教授（Professor Sidney Hook）曾經指出「杜威的著作被人引稱者多而被人閱讀者少」。本文作者亦曾發現杜威的「民主主義與教育」自一九一六年出版以來差不多每年複印一次，但其中許多排印或原稿的錯誤，直至一九五九年最後一版，都是相沿未改一字。杜威其他重要著作如「經驗與自然」（Experience and Nature）和「自由與文化」（Freedom and culture）也有類此的錯誤。此等發現似乎證實了胡克教授的話。杜威的多數門人只是將老師所發表的若干觀念當做口號來宣傳，並用為教育實施的指導原則，並沒有將杜威的教育思想體系作通盤的了解。他們在實施時，

並將此等觀念作無限制的應用，以致趨向極端發生流弊。同樣，若干批評家也因缺乏對於杜威理論的了解，把這些流弊完全歸咎於杜威，以為這些都是杜威的教育理論實施後的結果。這是有欠公道的事，乃是若干批評家，從未通盤了解杜威的理論，甚至把杜威從未主張過的、或是曾經批評過和糾正過的若干教育實施，也歸罪於杜威。以上所概舉的各種批評，多數便屬此類。以下一一加以覆按。

我們先從自由問題開始。杜威在教育方面所主張的自由，就消極方面說乃是在思想過程中免於身體活動的限制的自由。從積極方面說便是智慧的自由，『爲了本身有價值的目標而從事觀察與判斷的自由。』他所注重的乃是自由的積極方面，也即是智慧的自由；他反對把自由的消極方面和自由視同一事。他所主張的自由不是「愛做甚麼便做甚麼的自由」，有如他的批評者吳德雲（Paul Woodring）所指出的那種自由（吳氏曾指出前進教育運動有五十七派之多，其中有一派便主張讓學生有愛做甚麼便做甚麼的自由“Do-as-you-please” Freedom）（註六）。這種自由，杜威早就在他的『在新學校中有幾多自由？』這篇論文中、以及在後出的「經驗與教育」一書中，加以批斥。在這篇論文中他寫着：『在批評前進的學校時，難以一概而論。但有些學校的確放縱學生，使其耽溺於言語、行動、以及儀態方面毫無限制的自由。有若干極偏左的學校確將它們所謂自由帶進到無政府的狀態。可是這種放任、這種行動的外部自由，僅是我們所談及的較大問題所包括的一部分而已。當具有本身價值的經驗從客觀的教材得到真正的控制和指導時，外部行動的過分自由，自然得着規範。就根本上說，正由於沒有通過有意義的教材以獲得理智的控制，便助長了可悲的自私、自負、鹵莽、和不顧他人的權利種種現象，而這些卻被若干人看做是與自由相伴而起的不可避免的現象，如其不是自由的根本要點。』（註七）在他的「經驗與教育」一書中，杜威重申其關於自由的見解。從杜威自己的話，可以證實在有些前進的學校中對於消極的自由的過分放任，與杜威本人的對於自由的主張無干。他非但沒有主張這種自由，他並且加以指責。至於把美國此時少年犯罪的增多歸咎於杜威在教育上關於自由的理論，更是無稽之談了。

杜威本人很少在其著作中用過「生活適應」（“Life adjustment”）這辭語。進化論既爲杜威教育原則的根據之一，「適

應」在其理論體系中，當然是一個重要概念。可是他的經驗哲學的整個體系卻不許我們把「適應」了解爲「遷就」（*Accommodation*），如他的批評者所設想他是如此了解的。甚至一個低等有機體，當其與環境發生交涉時，也不僅是被動的使它自身遷就環境，它還要同時改變環境與其自身，以求得適應——人類更不必論了！杜威在他的「民主主義與教育」中曾經強調說明有機體在尋求適應時的此種主動作用。他的工具主義（*Instrumentalism*）的整個體系便建立在這種對於環境的主動控制和實際改變上面。在他較後的著作中，他重言申明這種見解，他說：「試驗主義哲學實則意指真正的試驗的行動，引致情況的適應，而不僅是改造自身和心智以求適合這些情況。智慧的適應始終是一種再適應，是一種對於存在事物的改造。」（註八）杜威所真正主張的，和批評家所強派於他的主張剛剛相反。可是對於杜威一向作嚴厲批評的赫欽斯（*R. M. Hutchins*）卻曾正確的指出：『在美國，適應論可說是一種具有領導作用的理論。這種理論由於誤解杜威而生。因爲他不是一個文詞清晰的作家，所以當他說及適應環境時，他的意思是環境首先要改進的，而他的附從者卻沒有見到，是可以原諒的。』（註九）雖然有赫欽斯的很公道的辨正，可是其他批評家不顧杜威自己的言論，也不顧赫欽斯的辨正，仍然繼續指責杜威在教育方面主張個人對於環境的遷就，天下沒有比此更不公平道之事了。

論及職業教育，杜威從未採取純功利的觀點。他所主張的乃是綜合文化陶冶與職業訓練兩個對立的概念的一種崇高的理想。他需要使文化陶冶對社會有實用價值，使職業訓練對個人有文化陶冶作用。若把教育簡約爲純粹狹隘的、特殊的、機械的和實用的訓練，杜威非但不贊同，並且將是首先要反對的一個人。美國教育中現在流行的受人詬病的職業主義，另有來源，并非來自杜威。杜威自然是不能負責的。

在若干前進學校中，確有不少的趨慕時尚的措施。教材與教法，天天在翻新出奇、變化無定之中。可是杜威非但沒有作此主張，并且常加以批評。在杜威看來，各種新鮮花樣并不是真正的教育經驗。它們加入課程以內，僅是迎合兒童一時的興趣，并不能促進教育的生長。他曾警告教師勿徒以新奇事物吸引學生，而失去教育意義。他說：『生活并不能與每一膚淺的動作與興趣混爲一談。兒童所表現的若干表面上好似毫無意義的動作，是否正是一種方生的、尙未經訓練的能力的表現，固

屬難說，但是我們必須切記這些表現本身決不可視為目的。』（註一〇）『教育即是生活，而不是生活的準備』，乃是一個很重要的口號。在教育方面有許多措施由此口號而引生，而許多缺失，亦由此而歸咎於杜威。杜威確曾於「我的教育信條」（My Pedagogic Creed）中有此說法。可是這是一種過甚之詞（An overstatement），他的真正意思并不如此操切。他實在以為，兒童生活在現在中，而他的現在生活是值得生活的，所以教育應該充分運用現在的生活。可是生活是一種發展，兒童生活是向成人生活發展的。兒童現在的生活雖有本身價值，但不應停止發展。當其發展時，現在生活富有發展為將來生活的可能性。這些可能性如充分加以探討和發展，則將來生活已經被準備了。實際上，杜威并不反對準備將來生活的。他所反對的乃是把教育看做只是對於將來生活的準備，他所反對的乃是離開現在生活而為將來生活作準備，而不是以現在生活為起點，而為未來作準備。要證驗此種解釋是否為杜威的實在用意，我們可以覆按他自己的言論。

在發表「我的教育信條」以前四年，即是一八九三年，杜威首先在「哲學評論」（Philosophic Review）討論教育為生活準備這一問題。他說：『假如有人要我指出在教育精神方面最需要的改革，我要說：「停止把教育看做僅是將來生活的準備功夫，應該從現在生活中表現教育的意義。」我更可說：「唯有如此，教育始能真正準備將來之生活。」這樣說並不自相矛盾，因為一種活動，如其自身無實行之價值，則為其他事之準備，亦不能有效。』（註一一）以上所引的一段話，代表杜威的原始立場。他並沒有說教育并不是生活的準備；他只是說教育不應被看做只是生活的準備。他在比「我的教育信條」後出二十年的「民主主義與教育」中重申此立場。他說：『教育應否準備將來，此乃不成問題的。假如教育是生長，它必然繼續不斷的實現現在的各種可能性，並且這樣做，可使個人較能應付將來的要求。生長并非在一時期完成之事，它是繼續不斷伸進到將來的。假如校內外的環境供給各種情境，來充分運用未成熟者現時的能力，那麼由現在生長而出的將來，已自受着了照顧了。錯誤不在於重視對將來需要的準備，而在於把準備將來作為現時努力的動機。』（註一二）從這段話顯然可見杜威所反對的，乃是生活準備的方式，而不是生活準備的本身。不僅如此，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說，杜威對於教育的重要貢獻之

」，正是對於準備將來生活提出了一種較好的方式——充分運用現在生活，以準備將來生活。

杜威從未提倡所謂兒童中心學校。主張教育應以兒童爲中心者，乃是前進教育家中小派。羅格(Rugg)與休邁克(Sumner)兩教授首先用「兒童中心學校」作爲他們合著一書的名稱。杜威在他的思想體系中，始終是要以聯續原則(Principle of continuity)來綜合在哲學方面和教育方面各種對立的觀點的。他的多數哲學和教育的著作所標的名稱，如「經驗與自然」、「人性與行爲」、「自由與文化」、「興趣與努力」、「兒童與課程」、「學校與社會」等，即是他運用聯續原則的明證。有許多作家以爲杜威所以採取此種原則與方法，乃由於早年受過海格爾的影響。杜威的方法確是從一較高的思想階層來包涵、調和、和綜合原來對立的名詞，使納入於一有機的整體之內，而彼此互相聯續。他的整個體系不許從應該調和的兩元對立的名詞中偏重其一。此種聯續原則貫徹了他的全部教育理論與實施。在他的著作中，著重點雖時有變遷，可是他所以如此做，正爲了抑止應該綜合的兩元中任何一方的極端的傾向而維持其均衡，並不是爲了偏重一方。

他的門徒，正如他的批評者，對於他的聯續原則多未予以適當的考慮；矛盾與混亂不免由此而生。即以兒童中心學校爲例。當杜威論及自由、興趣、獨創精神、需要的滿足和個性發展時，他從未忘卻對於正當的權威、努力與紀律、教師的領導和社會效率，予以適當的重視。至於在教育方面，以兒童爲中心，或以社會爲中心，他從未採取一偏之見。只因他的教育思想體系，原係對於傳統教育的反動，所以他論及兒童需要比論及社會需要時爲多。可是他的理想是要折衷於兩者之間的。他晚年的續繼批評前進的教育，足以表證他拒絕被認爲任何偏於一邊的教育哲學的權威。他是高出兒童中心與社會中心的教育理論家之上的。現在讓我們先聽他批評所謂兒童中心學校：「……此種結果的未能獲得，顯示兒童中心學校的觀念的偏頗性。我的意思，當然不是說教育不以學生爲中心。當然，教育係以學生爲始終的。但是學生并非一個孤立物；他并非遺世而獨立，卻生活在人與自然的世界中。他的各種經驗并非只憑他的衝動和情緒而完成；他的衝動和情緒伸展入於人與物的世界。並且當一種經驗未達相當成熟以前，所有衝動甚至不知向何處並爲何而進展；它們乃是盲目的，混亂的。如不能加以利導，那不僅是允許它們在盲目與紛亂的方式中活動，並且還促進幼稚不長進和自私的活動的習慣。」(註一三)從此可見杜威自

已對於兒童中心學校的偏頗性的批評，比反對前進教育運動者所作的批評還格外確當。

我們現在再考察在教育實施上的另一極端：社會中心學校。在近代教育史裏，杜威雖然是使學校與社會生活發生關聯的少數教育理論家之一，可是他從未主張學校應以社會或任何共同體爲中心。在教育方面，他反對過重權威的和偏於嚴格管制與管理的一切措施，可以證明他並不主張社會中心學校。他確曾主張以學校爲社會改造的動力，而他確有一崇高的改造社會的理想；可是他從不容忍在教育方面向學生以宣傳主義以求實現社會的改造的目的。

杜威的批評者認爲杜威應對於教育上的反理智主義 (Anti-intellectualism) 負責任。他們所謂反理智主義，乃指對於基礎科目的學習以及理智訓練的忽視。闕德爾教授曾經指出，這樣了解的反理智主義，在美國教育中已有長久的歷史。它不是從杜威的教育思想體系產生的。在哲學方面，杜威確曾反對理智主義 (Intellectualism)。可是他所反對的理智主義，另有意義。他說：「『理智主義』成爲罪狀，意指一種學說，此學說主張一切經驗均是認知之一種方式，而一切材料，一切自然界，在原則上都要經過簡約和改變，直至可用與科學名詞具有同一性質的名詞，加以定義而後止。此種理智主義的設想，與我們原始經驗的事實正相反。事物之爲被應付、被使用、被享受和被忍受之對象，過於爲被認知之對象。它們先被有而後被知。」(註一四) 在哲學方面，杜威把理智主義當做哲學的方法而加以反對，但是，「對於智慧和理性毫不放棄。」杜威在教育方面從未反對任何與理智有關的事物，從未輕視理智訓練。杜威在教育上非但不是反理智主義的，甚至有時還被人譴責他本人即爲理智主義的。他受此誤解，甚至不能不辯白說：「若謂這種方法(試驗主義的方法)是理智主義的，是誇大了思想，探究和觀察的地位而犧牲了情緒、欲望和衝動的，此乃不確之論。」(註一五) 在事實上，杜威對於理智有關事物之立場，既非理智主義，亦非反理智主義。他注重智慧的功用，可是他所指的智慧既不同於希臘哲學家的「理性」(Reason)，也不同於經院哲學家的「理智」(Intellectus)。他的智慧乃是一種方法，而非一種實體。而智慧之爲方法，乃是實用的 (Pragmatic)，非是認知的 (Cognitive)。因此他與哲學裏的理智主義無緣。他既然把智慧當做方法而加以注重，所以他對於與理智有關之事物予以重視，因此在教育方面他亦與反理智主義不相干。(註一六) 雖然如此，在美國教育的實施中，確

有忽視基本學科的學習和理智訓練的趨勢。此種近於反理智的實施，雖非出於杜威的主張，但與杜威教育思想體系不無間接的關聯，此則留待下文詳論。

對於杜威忽視精神價值的責備，主要的來自虔信宗教的人士。杜威的自然主義的哲學，確與任何對於超自然的事物的信仰是不相容的。可是在其晚年著作中，杜威確曾為宗教或「宗教的」(religious)保有若干地位。然而，他的宗教乃是在共同參與的經驗中、為了實現民主主義的社會而奮鬥、所具有的一種共同信仰 (A common faith)；凡對於此共同信仰具有虔敬的態度，便是屬於「宗教的」(Religious)。這種宗教，自然是不能滿足他的批評者的要求的。至於他在教育方面，除了對於民主主義的崇拜外，并未注重任何宗教的價值，也確是事實。可是杜威應否以此而受責備呢？我以為不應受責備。第一個理由是，對於超自然的事物的信仰或不信仰，乃形而上學之事。一種形而上學的信仰是不能憑事實或論辯加以證實或反證的。羅素 (Bertrand Russell) 在論及杜威哲學時，曾經說得好：「讀杜威的著作使我覺察到他的、也覺察到我自己的、不自覺的形而上學。當彼此的形而上學不同時，我以為無論為任何一邊辯護，總難免於邏輯上論點竊取之蔽失：在根本問題方面，此或為無可避免之事。」(註一七) 如其羅素的話是對的，那麼所有與杜威持不同形而上學的或宗教的信念的批評者所作關於杜威的自然主義哲學的批評，皆因犯了論點竊取，可不必置論。依上所論，在哲學系統方面，杜威固不應因忽視精神價值而受指責。在教育方面如何呢？根據政教分離之原則，學校原非宣揚宗教信仰之適當場所。杜威在教育上未注重宗教價值，此原為當然之事，顯然不足為罪。

以上覆按了關於杜威教育思想體系的各項主要的批評。我們從覆按的結果可以作一公平的論斷。假使我們的分析是正確的，那便可以斷定這些批評乃起於對於杜威的不了解、誤會或曲解，而杜威教育思想本身就這些批評而論，乃是無辜的。

三

上文是一直爲杜威辯護的。可是當一種思想體系在實踐方面如此容易爲人誤解或歪曲時，其責任亦不能全歸於那些將其理論付於實施的人。其理論本身必也有若干可議之處。依本文作者所見，杜威在教育上，似乎懸着一種太高的理想，不易圓滿實現。要實現其理想，必須具備若干先決條件。在這些先決條件之中，首先需要的爲合適的教師。正與杜威批評者所設想的相反，在實踐杜威的教育理論時，非但說不上「教師退位」(“Abdication of teacher”)，并且還格外加重了教師的責任。杜威並沒有爲了實踐他的理論的教師，規定任何實施細目。他認爲這樣做，是限制教師的智慧的運用的。他只提示了大綱，如何具體實施，要教師隨時因應。這樣的辦法，對於教師便要求更多的時間、精力、和智慧了。杜威自己也曾感覺到教師的重任。當他引述愛默生(Emerson)時，曾說：「正如愛默生所指明的，此種對於兒童時期與青年期的尊重，并不能對於教師開方便之門，而「立時對於教師的時間、思想、和生活，有無限的要求。」」(註一八)在他的「民主主義與教育」中，杜威亦曾指出，對於教師，實施新教育爲更煩難的工作。

實施杜威的教育理論，合適的教師固爲最重要的先決條件，但尚非惟一條件。充分的設備和學校建築亦是要件。胡克教授論及前進教育的條件時，說得好：「適當的條件爲學生少的班級，各式各樣的設備，具有實行前進教育的熟練技術的好教師，習於傳統教法的在職教師的訓練，更多的教職員，以及使課程適當地方需要的自由：這些乃是絕對需要的先決條件。如缺乏此等條件，前進教育乃是一種騙局和一齣滑稽戲。」(註一九)在教育最發達的美國，此等條件亦未能具備。杜威的教育理想，實在是太高遠。勉強實行，難免畫虎不成之譏。常受批評的前進教育的許多缺點，大都由於過早實施杜威的教育理論的後果。

實用主義大家如杜威者，其本人并不長於教學，其教育理論，亦不切於實際，難於付諸實施，此乃對實用主義的一大諷刺。在本文作者看來，爲要避免更多的紛亂和缺陷，杜威的教育理論體系還應該斟酌實際情形加以修改，才能獲得較好的實際效果。

杜威的教育理論體系不僅太高遠、不宜立即實施而已，它自身還有若干內在的困難，必須加以澄清、補充和修正的。在